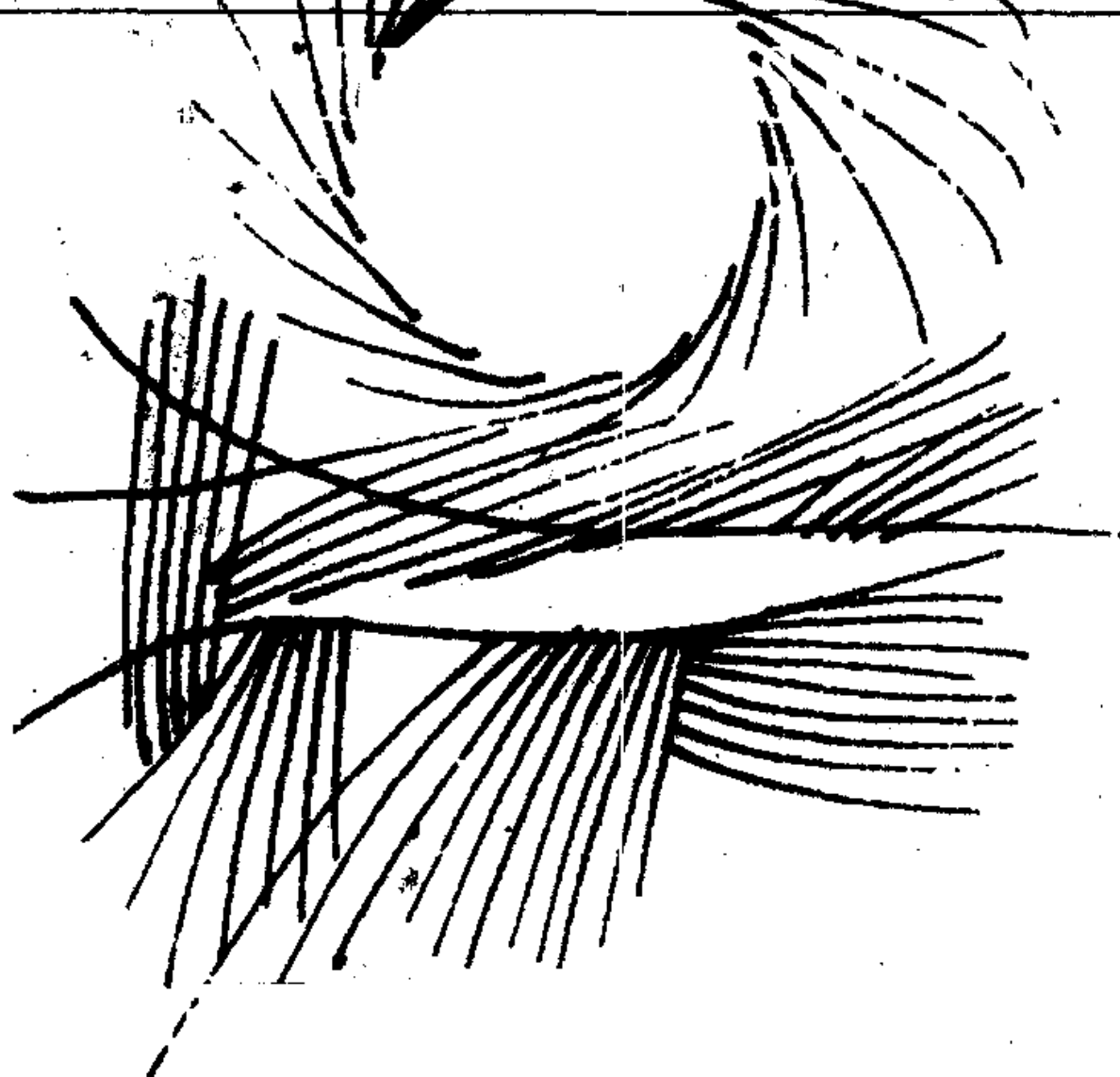


■ 社会理论译丛

所知世界的终结

——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冯炳昆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本书根据 Minnesota 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目 录

前 言	1
不确定性与创造力：前提与结论	1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世界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与共产主义的插曲，或当代历史的解读	7
第二章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	
世界体系中各派解放运动的过去与未来	21
第三章 东亚之兴起，或 21 世纪的世界体系	37
附论 所谓的亚洲危机：长时段的地缘政治	53
第四章 国家？主权？过渡时期资本家的两难境地	62
第五章 生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没有出路	82
第六章 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敌对的兄弟？	94
第七章 社会融合与边际化	113
第八章 社会变迁？变是永恒的。一切不变	129

第二部分 知识世界

第九章	社会科学与当代社会：消失中的理性保证·····	149
第十章	社会科学中的分化与重建·····	171
第十一章	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社会科学的两难境地·····	185
第十二章	知识之诸结构，或我们可能知道多少组成 方式？·····	201
第十三章	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与将来的消亡·····	209
第十四章	社会科学与对公正社会的寻求·····	220
第十五章	社会学的遗产，社会科学的前途·····	240
著者注释·····		276
索 引·····		303

前 言

从 1994 年至 1998 年，我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根据我认为在 21 世纪会有一个全然改观的世界的主张，我力促该协会将重新评价社会科学之集体社会知识的需要作为其中心任务。因为那时我作为该协会的主席，应邀到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许多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决心贯彻我自己的倡言，而且利用这些场合阐述我对 21 世纪社会科学的课题的看法。

这些文章写成后，帕特里克·威尔金森（Patrick Wilkinson）读了不少；这本书英文版的书名：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我们所体验和理解的世界之终结），就是他提出来的。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一直在撰写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所体验和理解的世界之终结”；英文的“know”有双重涵义：体验（拉丁文的 cognoscere）和理解（拉丁文的 scire）。我抓住这一洞见卓识，用以编辑这个论文集，把它分作“资本主义世界”和“知识世界”两个部分。前者取其框出我们的现实总体之意，即我们所体验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后者取其学会认识世界之意，即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知识世界）。

我认为我们正在黑暗的森林中摸索徘徊，关于我们的去向还不够清楚。我相信我们亟须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这场讨论必须是真正世界范围的。我还认为，在这场讨论中，我们不能把知

识、道德和政治分开处理。在开首的那篇“不确定性与创造性”里，我想简短论证这一点。我们在从事一场特殊而困难的争论，但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

译者按：这篇“前言”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为中译本重写的。2000年1月27日著者从巴黎发来如下意见：

将此著作的书名《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译成我通晓的任何语言都有一个问题。这包括所有的罗曼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以及日语。汉语大概也是一样。英语“know”有两种不同的用法，这在多数其他语言中是分成不同的字词的。第一个含义是凭理解力去弄懂（拉丁文为 *scire*），而第二个含义是具有某事或某人的经验，从而熟悉那件事或那个人（拉丁文为 *cognoscere*）。

本书的英语书名是这个双重含义的运用。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来自 *cognoscere* 的知识，而第二部分讲的却是来自 *scire* 的知识。

所以，如果使用这两个含义之一来译书名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例如，在法语中，这个书名既不是《La fin du monde que nous connaissons》，也不是《La fin du monde que nous savons》。在其他各种语言中实际上也可能是这样。

那么怎么办呢？我建议，除英语之外，在所有的各种语言中我们采用本书的副标题：《21 世纪的社会科学》。^{*} 现附寄考虑到改变书名而重写的“前言”。……

^{*} 本译本采用简化的标题：《所知世界的终结：廿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不确定性与创造力：前提与结论

我认为，21 世纪的前半叶将是更为更加困难，更加令人不安，但却比我们在 20 世纪所知道的一切更有开放性。我这样说有三个前提，不过在这里我都来不及予以论证。第一是说，百凡历史体系，就像一切体系一样，都是生也有涯的。它们有起始，有长程发展，而最后，当它们远离平衡态而达到分岔点时，便有消亡。第二个前提是说，在这些分岔点上，有两点确实无疑：其一曰小投入有大产出（与体系的正常发展时期相反，那时是大投入有小产出）；其二曰这种分岔点的结局素来是不确定的。第三个前提是说，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业已进入晚期，而且不大可能再存活五十年。然而，既然其结局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不知道从而发生的体系（或诸体系）是否会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体系更好或更坏。但是，由于转变的代价如此高昂，结局如此不确定，而且，以小投入影响结局的能力如此强大，我们的确知道，此转变期将是非常严重的动乱时代。

不少人认为，共产主义各国在 1989 年的解体标志着自由主义的伟大凯旋。依我看来，倒不如说，它标志着作为现代世界体

* 本篇为作者在布拉格 1997 年 9 月 3~6 日举行的“2000 年论坛：新千年门槛上的忧思与希望”上的讲话。

系特有的地缘文化的自由主义必定坍塌。自由主义实质上作过保证，那就是说，逐步的改革会改善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现象，减缓严重的两极化。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之内可能实现这一切的那种幻觉，实际上成了一个很大的稳定要素，因为它使各个国家在其国民的眼里有了合法性，而且向他们承诺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人间天堂。共产主义各国的瓦解，连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崩溃，以及西方世界对凯恩斯模式的丧失信心，这三者同时反映人民对它们各自标榜的改革纲领的真实可靠打消了幻想。但是这种幻灭之感，不管多么有道理，却是从根本上打破国家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有效地抵消让人民容忍世界体系不断加剧的两极化的任何理由。所以，我预计会发生相当大的动乱，类似于我们在90年代已经见到的那种，从世界这端的波斯尼亚和卢旺达蔓延到世界上较富裕（据说也较稳定）的地区（诸如美国）。

如我所说，这些是前提，既然我来不及予以论证，^①你可以不予置信。所以，我只是想从这些前提引出道德的和政治的若干结论。第一条结论：与各种形式的启蒙运动所鼓吹的不同，进步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并不认为它因此就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世界在道德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本来有此可能。我们能够朝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也就是理性价值和理性目的而运动，集体而明智地达到这一点。

第二条结论：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先决条件，对于确定性的信念是令人蒙蔽、为害不浅的。现代科学，即笛卡尔—牛顿的科学，一向建立在对确定性的肯定上面。其根本性预设认为：有一些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客观普遍法则存在，科学探索能够搞清楚这些法则，而且，一旦认识这种法则，我们就能从任何一组初始

条件出发，完满地推演出后继的和先前的状态。

人们往往辩称，这种科学观不过是基督教思想的世俗化，“自然”只是上帝的替身，而必具的对确定性的假定则来自宗教信仰的真理，这两者可相比拟。在这里我不想引起对神学本身的讨论，然而我总是认为，作为至少是所谓西方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普遍观念，即对全能的神的信仰，其实在逻辑上和道德上与对于确定性的信念，或至少对于任何人文确定性** 的信念是不相容的。因为，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人们就不能以宣布他们所信仰的是永恒真理来约束他，否则神后来就会不是全能的。毫无疑问，现代早期的科学家有很多是十分虔诚的，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是在论证与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相一致的一些命题，而且那时的许多神学家确实使他们有理由那样想。但是，如果说对科学的确定性的信念是对宗教信仰系统的必要补充，那根本就是不对的。

此外，在自然科学本身的内部，对确定性的信念现在遭到严厉的、而且可以说是很有效果的攻击。这只需看看伊利亚·普利高津的新著《确定性的终结》^②就可以了。该书著者认为，即使在自然科学最核心的部分，即力学的动力学系统，这些系统仍然受到时间之矢的支配，而且不可避免地远离平衡态而运动。这些新观点称为复杂性科学，部分地因为它们认为牛顿的确定性只在很有限的、很简单的系统中有效，同时也因为它们认为宇宙显出复杂性的演化发展，而线性平衡态和时间可逆性的假定不能解释绝大多数情况。

第三条结论：作为宇宙间最复杂的体系，人类的社会体系最难分析，为争取良好社会的斗争是继续不断的事业。况且，正是

* 指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溯言”过去。

** human certainty，指不同于自然界的、关于社会问题的确定性。

在一种历史体系向另一种历史体系（其性质我们不能预先知晓）过渡的时期，人类的斗争最有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这种过渡时期，我们称为自由意志的东西才胜过使现存体系回归平衡态的诸般压力。所以，根本的变革是可能的，即使绝非必然。这就要求我们具有道德责任感，采取合理行动，真心诚意，而且有力地寻求一个更好的历史体系。

我们不能知晓这个体系在结构上会像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说的实质上合理的历史体系来制订准则。这是一个大体上平等和大体上民主的体系。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根本看不到任何冲突，反之我要指出它们本来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历史体系如果不是民主的，它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因为不民主的体系就是不平等分配权力的体系，而这就意味着它也会不平等分配一切其他事物。如果历史体系不是平等的，它就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不平等的体系意味着某些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物质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我所得出的第四条结论认为，不确定性是奇妙无比的，而确定性，如果真有的话，会是道德的死亡。如果我们确实掌握未来，就不可能有做任何事情的道德冲动。既然一切行动都落入业已注定的确定性内，我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陶醉于各种激情和追求各种利己主义*。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向创造力敞开大门，这不仅是向人文创造力，而且还有全部自然的创造力。它向可能性敞开大门，从而通向更好的世界。然而，只有在我们准备好为其实现而倾注我们的道德能量，而且，对于那些不论靠什么伪装和借口都宁愿选择不平等、不民主的那些人，随时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 egoism, 指在对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理想的狂热追求中，一切手段均可利用。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世界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与共产主义的 插曲，或当代历史的解读^{*}

一段共产主义的插曲吗？那么，是在哪两者之间的插曲呢？而且，首先的问题是插曲所占的时间。我想它所占的时间应该是从1917年11月（所谓伟大的十月革命）到1991年，那年8月苏联共产党解体，12月苏联本身解体。在这段时期内，有些国家受俄罗斯及其帝国，以及东—中欧的共产党、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统治。诚然，迄今亚洲还有几个国家，即中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越南和老挝，自认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统治，此外还有古巴。但是，存在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时代已经完结。在我看来那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博得重大支持的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所谈的就是简单意义上的一段插曲；在某一时点之后出现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有一些自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组成团结一致的阵营，而如今我们却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以后的时期内。当然，那个时代的影子在1917年以前就

^{*} 国际社会学协会于1996年9月15～17日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举行地区性讨论会，主题为“建设开放的社会及东—中欧社会学前景”。本篇为作者在讨论会上的讲话。

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的《宣言》中就已断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而且，以许多方式，这个幽灵现在仍然在欧洲徘徊。只是在欧洲吗？让我们讨论一下吧。

在 1917 年以前这个幽灵是什么？在 1917~1991 年期间它是什么？如今它是什么？我想，关于这个幽灵在 1917 年以前是什么，达成一致看法并不太难。那时所谓幽灵，就是说，“人民”——被视为大都未受教育、无教养和质朴简单的群众——以某种方式起而作乱，破坏和没收财产，而且或多或少予以重新分配，把政权交给不尊重才能或个人主动的人们来统治。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会破坏在国家传统里被认为是宝贵的东西，其宗教传统当然包括在内。

这不是一种全然虚妄的恐惧。在从帕斯捷尔纳克原著《日瓦戈医生》改编的电影中有这样一幕：革命后不久日瓦戈医生从前线回到他在莫斯科的比较阔气的住宅，迎接他的不仅是他的家庭，还有很大一群人，他们已经占据他的家作为新的住所。在这所豪宅中，他自己的家庭已被赶到一个单间里住。日瓦戈医生代表的是实质上理想主义者的俄国知识分子。人们以颇为咄咄逼人的口气问他对于这个新的现实有什么想法，他回答道：“这是一个更好的安排，同志们，更加公道。”^①终其坎坷的一生，日瓦戈医生一直相信这是更好的，尽管留给读者观众的是比较暧昧的心情。

我们相当了解 19 世纪欧洲的政治与社会史。请让我概述一下。在法国革命以后，有两个观念广泛流传而且为日益增多的欧洲人所接受；这种观念在法国革命以前多数欧洲人本来会认为是奇特的。第一个观念是认为政治变革是绝对正常和可预期的现象。第二个观念是认为主权、国家主权不属于统治者或立法机构，而属于所谓“人民”。这些不仅是新思想，而且是激进的思想。

想，令多数有产者和当权者感到不安。

这套新的价值观超越特定的国家，我称之为世界体系的新兴地缘文化。它是伴同多数欧洲国家在人口与社会建构上的重大变化而发生的。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工资劳动者所占百分比提高。在一些欧洲城市中，雇佣工人突然大量集中于某些地方，生活条件普遍很惨，遂形成由大多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的人们所组成的新兴政治势力：他们经济上困苦，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不论在全国的或当地的政治生活中都没有发言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所指的对之呼吁的都是这个群体。

在 1848~1917 年期间，欧洲发生了两件事对于这个局面有影响。第一，不同国家的政界领袖开始推行改革计划，所谓“合理的”改革，旨在回应这个群体的抱怨，减轻他们的困苦，和安抚他们的疏离情绪。尽管进度与时机有所不同，多数欧洲国家均实施这种计划（我把白人定居者所建的主要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包括在我所说的欧洲国家之内）。

这种改革计划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是选举权，各国谨慎地推行并且逐步扩大适用范围，或迟或早全体成年男性（此后还有妇女）均享有投票权。第二项改革是补救性的工作场所立法，加上利益重新分配，即我们后来所称的“福利国家”。第三项改革，如果可以用改革一词的话，就是创建国家认同感，这主要是通过强制性初等教育和普遍服役制（对男性公民）。

这三项内容，即通过投票选举而实现政治参与、通过国家干预而减轻因失控的市场关系而造成的两极化后果、以及超阶级的一致为国效忠，合在一起构成自由国家的支柱，甚至实际上成了它的定义。到 1914 年自由国家已经成为泛欧的准则和局部的实践。在 1848 年以前所谓自由派和所谓保守派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在 1848 年以后大为减少，因为这两派对改革计划的评

价趋于一致，虽然，关于改革的进度以及在何等程度上应该保持对传统象征和权威的崇敬，这两派当然还继续争论。

与此同时，在欧洲兴起一种间或被称为社会运动的现象，其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工会，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或劳工的政党。这些政党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虽然在当时和此后，对这一点的真正含义一直在不断争议。在这些政党中最强大的，而且本身和对多数其他政党来说堪称“样板”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就像多数其他政党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一个主要的实际问题：是否应该参加议会选举？（以及继起的问题：党员是否应该参加政府？）结果，这些政党以及它们的活动分子绝大多数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其理由颇为简单：借此他们可能为其选民直接做些好事；最终，由于扩大选举权和充分的政治教育，多数人可能选举他们全面掌权；而一旦掌权，他们可能合法地结束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有某些前提作为此项推理的基础：其一是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观点，如果人们有了机会而且受到教育正确认识什么是合理的利益，所有的人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合理利益而行动。其二是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历史站在社会主义事业这一边。

在1914年以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这条路线使它们实际上从革命力量，如果它们曾是的话，转变成不过是中派自由主义的一个多少较为激进的派别。虽然还有不少这类政党使用“革命”的语词，它们不再真正把革命视为参加起义甚至诉诸暴力。革命倒是变成了对于某种戏剧性政治事变的期待，例如得票60%的选举胜利。因为那时社会主义政党总的说来选举成绩还很差，在投票中预期的胜利尚带有革命的心理色调。

后来出现列宁，更确切地说，出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的分析有两个重点。第一，布尔什维克认为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是革命的，最多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第二，他们认为，不论别的地方怎样为这种“修正主义”辩护，它与俄国的现实无关，因为俄国不是一个自由国家，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可能通过投票实现社会主义。事后回顾，不能不说这两项评估似乎是十分正确的。

布尔什维克从这种分析得出重大结论：如果不通过起义夺取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俄国决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言外之意认为任何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得到认可的历史主体），虽然实际上还是少数，必须自行组成有严密结构的干部党，筹划和组织“革命”，以便举行起义。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为数很少，这一点对隐含而未明言的推理来说，比列宁及其同僚所承认的更为重要。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得到的理论说明：在既不富裕又未高度工业化，因而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核心地带的国家里，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十月革命的领袖们认为他们自己领导了现代历史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更为现实地说，他们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及半边缘地带领导了首批民族解放起义中的一次，而且可能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然而，这一次民族解放起义与众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它是由以普适性意识形态自命的干部党所领导，所以接下去就创立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下的世界性政治组织；第二，这场革命发生于中心地带以外的特定国家，在那里它是工业上和军事上最强的国家。1917~1991年共产主义插曲的全部历史衍生自这两点事实。

一个政党宣称自己是先锋队，而且致力于取得政权，那么，它只能是专政独裁的政党。如果党把自己定位为先锋队，它必然是正确的。如果历史站在社会主义这边，那么，先锋队党通过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每一个人，包括被视为先锋队、亦即工业无产阶级的那些人，正是在理所当然地实现全世界的注定命运。诚

然，如果它不这样做，它就会失职。此外，在全世界这种政党中如果只有一个掌握了国家权力，像从 1917~1945 年的实际情况那样，而且如果它要建立一个国际性干部组织，那么，那个当权国家的政党变成领导党的确似乎是自然合理的。无论如何，这个政党拥有担当这个角色的物质手段和政治手段，足以排除任何反对。所以，如果说苏联的一党制政权及其对共产国际的实际控制乃是先锋队理论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似乎不失为公允之论。而且，随后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如清党、古拉格群岛和铁幕，即便并非全然不可避免，至少也是非常可能出现的。

在这些事件的发展中，其他国家对俄国共产党政权的明显和持续不断的敌对无疑起了大作用。但是，如果把这些发展归咎于那种敌对，确实属于强辩，因为列宁主义理论曾预示那种敌对，所以敌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权一直知道它必须对付的外部世界的常态。

敌对是预料得到的。政权的内部安排是预料得到的。或许较难预料的是苏维埃政权的地缘政治问题。布尔什维克先后作出四项标志转折点的地缘政治决策，而这些决策我看似乎并非必然就是苏维埃政权当时所能采取的惟一路线。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重新组建俄罗斯帝国。在 1917 年，俄罗斯帝国军队陷入军事混乱，而大批俄国民众要求“面包与和平”。在这种社会形势之下沙皇被迫逊位，而且，经过一段短暂时期，布尔什维克便能向冬宫发起进攻，夺取国家政权。

起初，布尔什维克似乎对俄罗斯帝国本身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毕竟是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坚决认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是邪恶。他们把芬兰和波兰都“放弃”了。人们可能不相信他们的善意，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危急时刻设法稳住阵脚。我倒是认为这是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成见的一种直接的、几乎本能的反应。